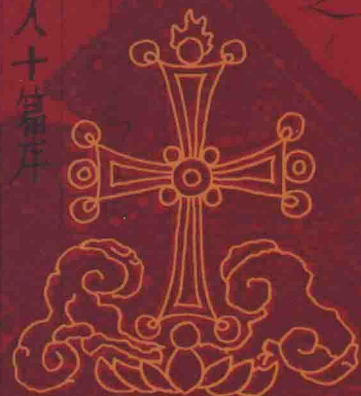




十字蓮花

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

梁元生 著

絕始者以為異人已觀其不婚不

子方飭

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

以為是

人也復徐叩之其持議

時人十篇

關邪

手不釋卷經目能逆順

及性命博及象緯輿地旁及白股

所有中國儒先果世發明未晰者而

不為數一二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

十年所習之益深所稱妄妄行

我肯強部爭而所參知天和人

ISBN 962770614-0



9 789627 706144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 CULTURE



景風叢書

十字蓮花

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

梁元生

香港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04

景風叢書 12

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

梁元生 著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出版

香港·沙田·崇基學院神學樓地下

電話：(852) 2770 3310 電郵：info@cscrc.org 傳真：(852) 2603 5224

執行編輯：陳志浩

©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

版權所有。未經本社書面允許，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傳送或貯存本書之任何部分。

二零零四年初版

承印：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六號金萬豐工業大廈十五樓A室

ISBN 962-7706-14-0

Ching Feng Series 12

*Cross-Lotus—Se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Christianity: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 Philip Yuen-sang Leung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Ground Floor, Theology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Tel. (852) 2770 3310 Email info@cscrc.org Fax (852) 2603 5224

Copy-edited and typeset by Chan Chi-ho

Printed in Hong Kong by Wise & Wide Design & Printing Co. Ltd.
Flat A, 15/F, Kam Man Fung Factory Bldg., 6 Hong Man St., Chai Wan, Hong Kong

First published 2004

©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序言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世界歷史中極其重要而且影響深遠的一件事。這不單止是大部分中國基督徒所關心的，也是許多對文化交流及歷史研究有興趣的中外學者所注目的題目。過去三十多年來，我一直都對這個範圍很有興趣，最初是從基督徒的立場出發，後來更多的摻進了教學和研究的角度和需要。

我在中學後期接受了基督教，一九六八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此校也是由基督教人士創立的學校，每個星期的週會都能感受到基督教的禮儀和氣氛。雖然我唸的是歷史，但我特別留意一些與基督教相關的歷史，例如在西洋通史的課裏，我選擇了早期基督教在地中海區傳播作為學期論文的題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課中，我則以〈明末的西潮——耶穌會傳教士與中國知識份子的交往〉作為論文題目，這篇作業後來經過繼續研究和發展，成為本書內〈求索東西天地間〉這一章。我於一九七二年畢業後，進入研究院，在王德昭老師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研究，此論文亦與中國基督教直接有關，即《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一九七八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成書，這是我進入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第一步成果。其後旅美，在加州大學繼續中美外交史的研究，本來希望博士論文

能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傳教歷史為範圍，但後來改以晚清上海道台為題目。此後多年，我在新加坡和美國教學，一方面由於教學所需，另一方面卻是自己喜歡旁鶩的性格，對中國近代史之外的學術研究，興趣越推越廣，包括了思想文化史、近代城市史、儒學研究、華僑研究等各個不同的領域。然而，對於中國基督教史，始終未能忘情。一九八二年，我寫了〈宗教與革命——新加坡華人基督徒對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反應〉一文之後，即與裴士丹教授（Professor Daniel Bays）取得聯繫，希望繼續有關研究，但後來因為投入新加坡的儒學計劃和東亞哲學研究所的創辦，故此未暇開展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此後多年在美國教學，只能對基督教在華歷史及耶儒文化之比較作業餘性的探究。回到香港之後，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次相聚，互相砥礪，吳梓明、李志剛、盧龍光、李金強、梁家麟、邢福增、黃文江等皆在其列。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及學術刺激之下，我也就加倍地努力，數篇史學史的論文，都是這幾年間的成果。其中關於李之藻的一章（本書第二章），曾經收入拙著《歷史探索與文化反思》一書（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5）；而關於英斂之家庭的文章（本書第十一章），則曾經在賴品超和李景雄所編的《儒耶對話新里程》（香港：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0）刊載，在此謹致謝意。至於本書第一章和第十章，以及本書第十二章，則最初分別應《基督教週報》和《時代論壇》而寫，後來作了一些修訂和加上了注釋，於此並申謝悃。

當然，個人的身份認同和力求客觀的學術研究縱使有時會產生一些矛盾或張力，但卻不是完全扞格不入、互相抵觸的。這種由此文化不同而產生的張力，會導致誤解甚至仇殺，但也

會成為啟發的泉源和創新的力量。這本書中的文章，可以說就是一個「天人之間」和「東西之間」的「之間人」從這個中間點出發和追求的結果。

最後，本書能夠在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得到社長盧龍光教授及副社長葉菁華先生的協助，以及隱名評審者細心指出一些文章中的錯漏，在此一併致謝。

梁元生

二零零三年九月於香港中文大學

目錄

	序言	vii
第一章	石頭記 一塊玄碑的多重故事	1
第二章	求索東西天地間 李之藻由儒入耶的道路	19
第三章	路漫漫其修遠兮 「中國摩西」黃乃裳及其「出埃及記」	40
第四章	從「慘劇」到「神跡」 義和團史學與山東基督教	51
第五章	宗教與革命 早期新加坡華人基督徒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反應	74
第六章	死亡與復活 中國近代教會大學的歷史發展	101

第七章	天人、中西、城鄉	
	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發展的幾個弔詭	113
第八章	兩刃之劍	
	基督教與中國革命的再思	131
第九章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改良的、革命的，抑或是保守、反動的力量？	144
第十章	中國與基督教	
	史學的再思與重構	161
第十一章	三重身份的融合	
	中國現代歷史行程中的英家三代	175
第十二章	天國與人文	
	基督教與新儒家	193
第十三章	〇與1之間	
	儒家和基督教人生觀之比較	207
第十四章	天道與人生	
	儒家和基督教之終極關懷	212

第一章

石頭記

一塊玄碑的幾重故事

一、楔子

這是一塊石頭的故事。不，一塊石頭的多重故事。

這塊石，並非《紅樓夢》裏所說的那塊寶石；這個「石頭記」，也非坊間所流傳的《石頭記》。

這塊石是塊玄碑，正確地說：是塊黑色的大石頭。

它本身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有一段驚心動魄、充滿傳奇色彩的經歷。而在它上面也有一個動人的故事。它上面的碑文，刻著一段湮沒已久的，但卻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璀璨的歷史。再者，這塊玄碑的研究論述，由中國而西方而日本，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以下就讓我分別述說這塊石頭的多重故事。

二、石頭的故事

這個傳奇可以分為四段：破土、驚世、偷天、歸宿。

第一幕：破土

時維公元一六二五年，即明朝熹宗天啟五年。

地點是古都西安城西南近郊的盤屋（今周至縣）。

是年年初，這裏的一位居民因為要改建房子，所以大興土木。工人掘地時，於一堵敗牆之下，發現了這塊黑色的大碑石，其上刻著三十二行漢字，兩旁有七十個僧人的名字和一些看來像蝌蚪似的文字。碑的上端雕刻著飛雲和蓮台，烘托著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工人把它掘出來後，量度一下，發現這塊玄碑有十呎高，三呎餘闊，厚約一呎，而重量則達兩噸。西安府內不少的士人，聽到這個玄碑出土的消息，多有前來參觀和研究者。更有不少靈異神怪的揣測，最後驚動了官府，派人察驗之後，認為此乃佛教之遺物，遂派人把碑石搬到城外一哩處的金勝寺中。《陝西通志》有云：「金勝寺，即崇仁寺……即唐三藏法師譯經處。」¹

當時的人以為這塊玄碑為佛教聖物者，大有人在。林侗《來齋金石刻考略》云：「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三世因緣，此幾其淨頭陀再來耶？」又有傳聞曰：「此碑出土之地，冬日四

¹ 見《陝西通志》，卷十九。另有關盤屋縣資料，參《陝西通志續通志》（雍正十三年及民國二十三年刊）（台北：華文書局影印本，1969），卷五「建置四」，頁7；卷七「疆域二」，頁7。

圍積雪，惟碑土之上無之，數年如此。」²

總而言之，大家都認為此乃神石。其破土而出之後，安置於金勝寺中，當然吸引不少人來膜拜，使鄉郊寂寂的金勝寺，恢復了一點舊日繁華熱鬧的氣氛。

但誰也不會料到，這塊出土的黑石，還有震動全國，甚至驚動世界的大能力。

（鏡頭的焦點停在佇立於金勝寺中的碑石上。）

第二幕：驚世

住在西安附近岐陽的一個舉人，名叫張賡，³也聽到這塊玄碑出土的消息，故此也來到金勝寺參觀。他看到碑上所刻的漢字，字體清秀，是唐代文士呂秀巖的手跡。碑文則為僧人景淨所作。雖然不到二千字，但文義古奧，不易理解。可是，他隱隱然覺得此碑與一般佛道碑文有異。雖然各僧侶名字如業利、惠通、玄真及僧明等頗類佛家人物，但碑中所述之「景教」及其義理，卻又非與釋氏相同，令人疑竇叢生。張賡因此搔首踟躕，不忍遽去。碑上之教義雖是古怪難明，但又似曾相識，彷彿

² 林同，《來齋金石刻考略》卷下：「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雋慧，甫能行，便解作合掌禮佛……卜葬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引自足立喜六，《長安史跡的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3），頁232。

³ 張賡，字夏詹，又字明皋，福建晉江舉人。曾在京與西士游，交結士人中有李之藻、徐光啟輩。後入教，曾與韓合撰《聖教信證》。方豪曾為之作傳，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台中：光啟，1970），第一冊，頁259-62。其述張賡信教經過，曰：「張賡……當時為杭州教諭，亦被（楊廷筠）化進教，聖名瑪竇，奉教極熱心，與楊廷筠協助西士繙經譯傳，功德不訾」（頁262）。惟傳中並未述見景教碑事。

佛聽過。

張賡徘徊碑前，默思良久。

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往事。

那時他在北京為官，結識了不少朋友。但印象甚深的是一位來自域外的西洋人。此人滿頭銀髮，長髯抵胸，不婚不宦，博識廣聞，兼通天文地理，猶好性命之學。聽說他梯航萬里，來自西洋，故人稱他為西泰子。他自取名曰利瑪竇，字泰西。⁴張賡和他晤面時，他已然在北京居住多年了，而且和京城裏的許多大官顯宦皆有往還，其中聲名頗盛而跟利氏又往還最密的是工部侍郎李之藻。當張賡初識李之藻之際，李氏因皈依利氏西洋之教，還引起了好一陣的風潮，不少人都在那裏說長道短。⁵不過，張賡對李之藻敢作敢為的性格、好學奮進的態度，以及功忠為國的精神，倒是相當欽佩的。因此二人結交，以後也連繫不輟。

張賡細讀玄碑刻字，覺得碑文所述之義理，彷彿泰西利氏之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測，故此使人把碑文拓印下來，並修書一紙，連同拓本一起派人專程送到杭州李之藻的家裏。李氏一讀之下，發現所信之教，並非新近的舶來品，而在中國流行已

⁴ 利瑪竇 (Matteo Ricci)，意大利人，一五五二年生，一六一六年歿；一五七七年來華南傳教，後寓北京，譯書、傳教、交友，對中國影響很大，方豪稱之為「從古以來，所有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中，最出名的一個。」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 72。其詳細事跡，可參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⁵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與徐光啟和楊廷筠齊名。李受洗後，聖名「良」，故又字涼菴，號涼菴居士。李之生平傳略，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 112-24，方豪另有《李之藻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一書。對李信教經過之分析，見本書第二章。

近千年，乃喜出望外，作了一篇〈讀景教碑書後〉，其中有言曰：「岐陽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邇者長安中掘地取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今而後，中士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⁶在歷史中、傳統裏找到自己新信仰的印證，其驚喜可知耳。

西安出土的景教碑，與明末東來的天主教有著淵源之說乃因此傳開，引起了各地金石家與考古家的興趣，尤其是由歐洲來到中國傳教的西洋教士，便被這個大發現所吸引，不少跑到西安去觀看和研究。第一位見到這塊石頭的外國人，是法籍傳教士，也是後來享有盛名的漢學家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他在利瑪竇死後數年來華，用拉丁文編輯利氏日記，於一六一五年出版（*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有 Louis Gallagher 之現代英譯本，名曰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⁷他在景教碑出土的那一年，即一六二五年十月，就匆匆趕到西安金勝寺，去研究碑上的紀錄。第二位到西安去看這塊碑石的外國人，是葡萄牙籍的傳教士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⁸一六二八年來到西安，對景教碑進行了很仔細的研究和考證，又把碑文翻譯成葡萄牙文，在歐洲作首次發表，後來又繼續發表一些有關的著作。

⁶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此處引自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頁30。

⁷ 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 1577-1614），明末入華耶穌會士，著作甚豐，傳略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179-84。又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民27年初版；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版，1960），頁132-42。

⁸ 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 1585-1658），葡萄牙人，一六一三年到南京傳教，與金尼閣、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等共事。費賴之（Aloys Pfister）認為曾德昭是第一位親見景教碑的外國人。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頁170。

他的譯介和著述在整個歐洲掀起了一陣哄動。此外，又有陽瑪諾 (Emmanuel Diaz) 的研究，他的著作《唐景教碑頌正詮》(1614) 也傳閱甚廣。⁹ 短短十數年間，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學術界，掀起一股旋風，可算是眾人皆知了。不但宗教史家埋首鑽研，不少哲人文士也對它神往不已，冀欲一睹為快。但也有人對其真實性加以懷疑，如法國大文豪伏爾泰 (Voltaire)，就不信真有其事，認為此乃耶穌會傳教士偽造出來的故事，是引人相信的「敬虔的騙術」。¹⁰

但總的而言，這塊石頭從破土而出到十七世紀中葉的短短十餘年間，由無人能識到舉世皆知，真是一段不凡的際遇。

(鏡頭由中國地圖上的西安，逐漸擴大到世界地圖。多個箭頭由西安指向中國各地，最後指向歐洲。)

第三幕：偷天

天黑天亮，春風冬雪，年去年來。

從一六二五年起，這塊黑色的大石頭就佇立在西安金勝寺中。兩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它的興趣不輟。起初，在西安傳教的天主教士，甚至想把它拿回去送給梵蒂岡，但隨著清朝康熙禁教，教士的夢想也成了泡影。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來

⁹ 陽瑪諾 (Emmanuel Diaz, 1574-1659)，一六五九年入華之耶穌會士，曾在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宣教，方豪有傳，見《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一冊，頁 173-75；氏著《唐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影響甚大，有光緒四年(1878)上海慈母堂刻本，費賴之作《景教碑詮》，有一六四四年杭州刻本，一八七八年土山灣重刻本。見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頁 130。

¹⁰ 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法國啟蒙運動先驅，在其著述《中國書簡》中，嘲笑景教碑為耶穌會傳教士偽造的「敬虔的騙術」。見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 31。

華，也有許多傳教士對景教碑有濃厚的興趣，其中有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是十九世紀中葉基督新教陣營中的「中國通」，也寫過研究景教碑的文章。¹¹又有第一個把聖經翻譯成中文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zah Bridgman），也曾對景教碑作過詮釋。¹²此外，歷史家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都對這塊石碑有所研究。¹³十九世紀西方社會對景教碑的興趣，顯然比十七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並不遜色。

正由於西方對這塊石碑有著濃厚的興趣，因此就發生了一宗想要瞞天過海、偷天換日的偷石勾當。

大概在十九世紀末年，一位任職記者的年輕丹麥冒險家來到中國。他曾在上海和漢口工作，聽過景教碑的故事，不禁悠然神往。這位年輕記者名叫何爾謨（Frits Holm），才剛滿廿七歲。他對考古最有興趣，有著豐富的知識，把研究景教碑的文獻讀過之後，認為此碑乃世界考古學界之瑰寶，足可置身「世界四大石刻」之一。他所指的四大奇石就是一七九九年在埃及發現的「羅賽塔碑」（Rosetta Stone）、一八六八年在死海旁發現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在南美發現的古代亞茲特克族

¹¹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87）是十九世紀中葉來華教士，在上海墨海書館主持翻譯及著述，並主編第一份中文雜誌《六合叢談》，與上海士人如李善蘭、王韜、沈毓桂等皆有往還。其事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185。著有 *The Nestorian Tablet in Si-Ngan-Fou* (1890)。

¹² 裨治文（Elizah Bridgman, 1807-61），美國傳教士，一八三〇年抵澳門，入廣州，後主編《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內載多篇討論中國文化、歷史及景教的文章；參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98。

¹³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97）是傳教士漢學家，東來先至馬六甲辦英華書院，一八四三年遷香港，與文士王韜等結交，譯十三經為英文以馳名。一八八八年著 *The Nestorian Monument of Hsian Fu in Shen-hsi, China* (London: Trübner, 1888)。其事跡參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的「授時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以及景教碑。前三塊奇石分別貯放於倫敦博物館、巴黎羅浮宮及墨西哥的國家博物館中。

何爾謨在一九〇七年來到西安，親眼見到這塊玄碑之後，慨然說：世界上大概只有他一個人有機會親睹四大奇石。又說：在四塊石碑中，以景教碑保存得最好，堪稱「石中之王」(the stone of stones)。¹⁴

然而，這位年輕記者卻睹物起意，產生了壞念頭。他想把這塊石碑偷運出中國。據他自述，他先行買通了金勝寺一名僧人，又聘請一名石匠用黑色石塊仿製了一塊相像的石碑。石匠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才完，於此期間何爾謨則到開封、洛陽及龍門石窟等地去遊歷。到了九月，何爾謨回到西安，布署偷天換日的偷石計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當十月二日何爾謨到金勝寺再看石碑時，卻見碑去亭空，原來官府早已派人搬走石碑，安置於西安城內的古跡聖地——碑林——之中了。何爾謨不得已，只得把仿製品運出國，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過後，後來為人買去，再送給梵蒂岡。

日本史家足立喜六著《長安史跡考》，對此事也有提及，可作參考。書云：「丹麥人何爾謨等，僕僕至西安，出銀三千餘兩收買此碑，以便運往倫敦。正在秘密商量搬運之際，為北京政府得悉，急電陝西巡撫，命妥加保管。其時陝西高等學堂教務

¹⁴ 關於何爾謨的生平，見 Frits Holm, *Nestorian Tablet of Sian-fu: The Nestorian Monument: An Ancient Record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icago, 1909) 及 *My Nestorian Adventure* (1923) 二書，其在華偷碑事跡，見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頁 34-36。